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的文學思想

—歷史敘述、敘解模式及其自我重構

3 年期計畫第 2 年期中報告*

一、 研究背景

(一) 《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應有擴大方向之必要

1. 擴大補正訂誤、目錄版本以外的研究路向

湖北大學的學者周積明先生曾指出：《四庫全書總目》¹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完成以來，即得王昶、周中孚、繆荃孫、余嘉錫、張之洞等人的推崇，但這些讚語卻也存在著值得反省之處²：「如上所論，雖然無不高度評價《總目》的價值，但皆局限於從目錄學立論，即僅僅把《總目》看作一部體制完善、編制出色的大目錄書。……研究者也從刊誤、補正、考核、糾謬上下功夫。……但是，僅僅從目錄學的角度看待、研究《總目》，畢竟視野太狹窄。包容廣闊意蘊豐富的《總目》，決非『簿錄之書』或『目錄學著作』之名可以加以範圍。」在周氏的構想中，主張從整體學術文化的角度，加以掌握該書的內涵。至於在文學領域上，周氏直指《總目》的詩學思想、(文學)批評方法，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主題。

周氏曾藉用法國文化史家丹納(Hippolyto Adolphe Taine)的說法，認為《總目》「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品、一種客觀化的精神，因而必蘊含著鮮明的價值取向和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³換言之，在既有目錄學、文獻學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總目》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及其價值取向，應能開拓《四庫》學，乃至乾嘉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據陳曉華先生的觀察，大陸自 1980 年以降，《總目》研究站在傳統補正訂誤、目錄版本的基礎上，已展開《總目》經世價值取向、文化價值重估、經學觀、文風觀，乃至研究方法的重新探討，其中如黃愛平、張新民、葉文青、季野、吳承

* 【本計畫係為多年期，原計畫書在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上，未做年度區分。茲為求報告完整，故保留第 1 年期中報告上述諸項內容。】

¹ 《四庫全書總目》常或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等名，據大陸學者崔章富考證，自乾隆時期以降的二十四種版本，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名者，僅出現於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餘年間；至於《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內容或有出入，故仍應稱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乃《總目》修改定稿之前形成的，而「獨立在《總目》之外存在的許多〈提要〉傳本，相互之間差異甚大。如《四庫全書薈要》所載〈提要〉四百六十三篇，跟文淵閣所載比較，不同者二百八十篇，微有不同者四十六篇，合計三百二十六篇，達十分之七以上。」〈提要〉傳本已各自不同，其又與「《四庫全書總目》確實不是一回事。」見氏著：〈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三十六卷第一期，2002.6。本文採崔氏說法，並於後文一律省稱為《總目》。

²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書目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97.6。

³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9)，頁 56。

學、王記錄等學者，分別學術思想、學術方法、小說觀、詩文批評史、史學批評等範圍，從事《總目》文學、史學、經學等方面內在邏輯發展與變化規律的研究，並且掌握思想理路與時代互動性，斐然有成。⁴於是，《總目》可被視為一種反映學術思想之文本，研究者有重建其特定的價值取向、文化觀念之可能性與必要性。

2. 應擴大研究路向的理論基礎

《總目》應擴大研究路向的呼籲與實踐，約已持續二十年了。至於其應擴大的理由，約可從「『歷史理解』的性質」與「『提要』的引導性質」兩方面，加以掌握。

(1) 『歷史理解』的性質

首先，我們若運用西方詮釋學的觀念來看，「歷史理解」乃作為過去和現在的中介，⁵文本在歷史學家看來，是一種材料，一種做為可掌握意義的泉源；而歷史學家通過具體情況去理解文本的內容，並以整體的自我知識決定事件的歷史意義。文本在時間屬性上，是「過去」的；歷史理解在時間屬性裏，卻是從「現在」通往「過去」，並由「過去」返回「現在」的。首出的「現在」與再出的「現在」，最大的差異，是後者產生並賦予新的歷史意義。就此，周積明先生所謂《總目》是「文化產品」，應是就《總目》的成書而言；「客觀化的精神」，應指涵藏時代的情緒、思想、精神等，如其以樸學的實證態度，嘗試消解理學霸權，並有限吸納西學。⁶換言之，《四庫》館臣面對歷史文本（即四部諸圖書），通過具體文字表述其「歷史理解」（即《總目》對諸圖書之述評），而「歷史理解」的「現在」性，即帶入「客觀化的精神」。所以我們應可就其「歷史理解」的內容、過程，做一重新反省，以掌握其賦予新歷史意義的所在。舉例來說，大多學者同意《總目》的學術傾向，基本上是支持漢學而貶抑宋學的。但夏長樸先生從《總目》〈提要〉與《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進行研究，發現纂修四庫的原始目的在於關注宋學，但最後卻成為批判宋學而標榜漢學⁷，這種發現與觀察，無疑將《總目》的學術傾向予以「歷程化」。此「歷程化」乃相對於「固定化」而言，即我們通常從《總目》的文本論述，歸納整理其學術傾向，但其傾向是經過怎樣的變化而形成？又變化的理由何在？由某傾向轉成某傾向的內在邏輯、外在條件為何？都是值得我們去思想的問題。換言之，館臣「歷史理解」的「現在」性，是值得我們重新去思考、研究的課題。

⁴ 陳曉華：〈四庫總目學研究述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2006.7，頁138-144。這類總結觀察的論文，約略見解相同，可另參周積明：〈四庫學通論〉，收入氏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10），頁265-293；李杰：〈90年代《四庫總目》研就論文綜述〉，《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1年第3期；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述略〉，《圖書館雜誌》2002年第6期。關於文學的研究成果，請另見本計畫下節，此暫不贅說。

⁵ 貝蒂：〈作為精神科學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收入阿斯特、施萊爾馬赫、狄泰爾、海德格等著，洪漢鼎等譯：《詮釋學經典文選（上）》，（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2.6），頁159-161。

⁶ 同註3所揭書，頁57-79。另可參見同書所錄，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頁81-103。

⁷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卷2期，2005年冬季號，頁83~128。

吳光明先生曾說：「中國是一個具有豐富的歷史與歷史意識的文化，這項事實說明了，中國文化的『自我瞭解』，是透過具有歷史意識的自我詮釋而進行的。」⁸ 至於「自我瞭解」的活動與目的為：「中國人在歷史的過程中，進行『自我詮釋』而將中國的社會結構內在化，而成為中國人共同的心理結構。『自我詮釋』正是透過歷史性的思考來進行的。」「瞭解一個生命就是解釋他的「自我」，由此瞭解而解釋存在，我們回溯以往而領悟了這層道理，這種歷史性的瞭解是存在本身的自我顯示——通過人的存在，而這人的存在等於他的『自我解釋』」⁹因此，我們可以說：《總目》面對的述評對象，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文本；而述評本身就是「自我瞭解」的成果。所以，當館臣將心力投向外在的歷史文本時，他們同時也正進行內在的「自我詮釋」與「自我瞭解」，經過反思後的文化內容，將會反饋並成為自我心理結構的一部分。我們不妨進一步借用美國史學家卡爾·休斯克（Cril E. Schorske）的說法，將這種行為視為「自我重構」（Self-reconstruction）的動作¹⁰，而《總目》的主觀性質就在歷史理解與自我重構的間架中，逐步衍化、產生。

（2）『提要』的導引性質

因為《總目》具有目錄的性質，再加上館臣強調以考據態度撰作〈提要〉，所以我們容易忽略論述底層的主觀性。《總目》〈凡例〉第九條¹¹云：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瘡，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提要的體例來自「聖斷」，帶有強烈官方權威的意味，其下貫於書寫當中，包含了作者的「論世知人」，書籍的「訂辨」，以及個人表現（「人品學術」）、群體表現（「國紀朝章」）的詮釋與評價。換言之，在《四庫》館臣的觀念裏，歷史理解可以通過考究（「考本書之得失」）、權說（「權眾說之異同」）等工夫，獲得歷史圖像，使得圖像具有客觀性、正確性。可是，「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瘡，用著勸懲。」的說法，又何嘗不意指：我們對歷史圖像

⁸吳光明：《歷史與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9），頁123。

⁹吳光明：《歷史與思考》，頁122-123。

¹⁰卡爾·休斯克此處的說法，雖是針對20世紀現代主義與古代傳統關係的說明，故所謂的「自我重構」亦具有「歷史變遷不僅僅逼迫個人去探討新的身份，同時也要求整個社會群體，能夠擔起對垂死的信仰體系進行修正與替代的重任

」的意義，本文並不以「現代主義」與「傳統」的對列關係進行比附，而僅就歷史論述具有某程度「自我重構」而言。見卡爾·休斯克著、李鋒譯：《世紀末的維也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5），〈導言〉，頁1-2。

¹¹【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2），卷首三「凡例」，頁1（冊）-36-37。本文四庫全書版本全據文淵閣本，後不贅述，並省稱為《總目》。

的思辨與解釋，終是一種價值指向的解釋。「各昭彰瘴」的彰善瘴惡、勸善懲惡，就在通過具體歷史人物與著作的理解與建構中，逐步落實、完成。而理解與思辨的文本材料是個別的人物與著作，但個體生命終要還入群體生命之中，重新受到考量，乃至評價，故「論世知人」說明了館臣將文本材料往兩個向度延伸——個體的與群體的。所以，在建構歷史圖像的同時，「人品學術之醇疵」可受評價，「國紀朝章之法戒」亦需重視。上述種種努力，乃「悉承聖斷」，即政治權力瀰漫於思辨、解釋、評價歷史圖像中，以期完成當代「庶幾公道大彰，俾尚論者知所勸戒」的嚮往。總之，一旦涉及「善、惡」的區判與批評，價值標準勢必成立，其主觀性終不可掩飾。《總目》卷首〈凡例〉¹²第十五條云：

漢唐諸儒，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翬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并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讎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伏讀御題朱弁《曲洎舊聞》致遺憾於洛黨¹³，又御題顧憲成《涇臯藏稿》示炯戒於東林¹⁴，誠洞鑒情偽之至論也。我國家文教昌明，崇真黜偽，翔陽赫耀，陰翳潛消，已盡滌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漸，不能不慮遠思深，故甄別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畛域，以預消芽蘖之萌。至詩社之標榜聲名，地志之矜誇人物，浮辭塗飾，不可盡憑，亦併詳為考訂，務核其真，庶幾公道大彰，俾尚論者知所勸戒。

這段凡例指出一個歷史現象：漢、唐諸儒生雖謹守師說，但不致互相群聚成黨，操戈爭勝。可是從南宋到明朝，由於好為議論，無論是闡述經學、講揚學術、議論文學都各成門戶，甚至脫離學術文章的討論，彼此「仇隙相尋」¹⁵。《四庫》館臣為避免朋黨相爭，蠹害人心世道，所以在編收前人著作之時，更藉「一本至公」的標準，以期消除國家災難。其中以「考訂」為起點，去除門戶之見，致力「核真」，成就一套「公論」，便成為整理圖書的基本態度。然不可輕忽的是，館臣最終仍盼望「論者知所勸戒」。此正如劉墨先生所指出《總目》的兩大批評標準：「一、用比較客觀的方法來求得中國學術發展的基石：實證；二、講求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結合」¹⁶故《總目》並非僅以實證方式重建過去文獻的內容與客觀意義，亦講求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互相結合。

¹² 《總目》，頁1（冊）—38。

¹³ 《欽定四庫全書》中《曲洎舊聞》〈提要〉前錄有〈御題《曲洎舊聞》四首〉，第一首「留金弗紀金間事，曲洎依然紀舊聞。二帝播遷雖自取，禍緣新法變更紛。」第四首「清濁渭涇本自殊，操戈同室若為乎。因翻汝璞藏獨本，畧恨爾時程與蘇」《曲洎舊聞》乃追述北宋遺事的著作，對於「新法」及黨爭多有著墨，故有御題絕句中的慨歎。

¹⁴ 《涇臯（〈凡例〉作臯）藏稿》未見御題詩文，《總目》云：「姑錄其集並論末流之失，以示炯戒」倒直言收錄此集的訓示意義。4（冊）—564-565。

¹⁵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敘〉云：「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亦屬此類看法。頁4（冊）—2。

¹⁶ 劉墨：《〈四庫全書〉及其評價標準》，見氏著：《乾嘉學術十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11），頁212。

近年致力於目錄學理論化的周彥文先生，也曾以明代文學為例，指出《總目》將萬曆以後的文學，進行了負面的評價，並且「很明顯的貶抑明末的文學，並大力提高清初文學的振興局面，給後人一種聖朝臨治，文教大興的印象」並據此稱《總目》為一種「導引性」的提要¹⁷。「導引性」即表現出一分主觀的態度與企圖。當然，館臣是否是單純地抑明末文學以烘托清初文學之振興，而毫無文學藝術之內部考量？尚待我們進一步檢討，但是〈提要〉可能的主觀性，終是值得正視的現象。

總之，近二十年來的《四庫》學研究，雖已有數位學者別出考證路數，自文學角度研究《總目》，也頗有佳績，然專就集部各類做相對封閉性的探討尚少，更未曾重建《四庫》館臣所構築的文學思想史圖像，並探討圖像形成的底蘊。所以，本人承蒙國科會九十五年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展開「《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文學批評史圖像」的研究。在研究中，將「詩文評類」的〈提要〉視為「文學批評」的文本；而《總目》對前代批評著作的述評，又視為「歷史理解」的內容。因此，《四庫》館臣通過怎樣的歷史觀點與美學標準來表述文學批評的概念、建構文學批評史的圖像等，就成為該計畫所欲探討的學術議題。但在研究「詩文評類」的過程中，發現館臣在考證以外的評價與詮釋之語詞，往往簡短而片斷，若要勾合《總目》整體的文學思想，勢必然得擴及他類〈提要〉¹⁸，故九十六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為「《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的文學思想——考察『選本批評』的再批評意識」乃以集部「總集類」為研究對象，將「總集」視為「選本批評」，擴大研究範圍¹⁹。事實上，館臣的批評史論述與文學史是相即的，故此次三年期計畫擬將視野轉向「別集類」，並綜合批評史、文學史論述（全文簡稱為「歷史敘述」）為觀察重點

（二）「文學思想史」²⁰研究應有填補隙縫之必要

1. 《總目》與文學研究

朱東潤先生曾說：「曉嵐論析詩文源流正偽，語極精，今見於《四庫全書提要》，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於紀氏者」²¹朱自清先生亦指出：「《四

¹⁷ 請參見氏著：〈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書目季刊》，第三十九第三期，2005.12，頁34-37。

¹⁸ 此處尚有值得討論者，請參見下文「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¹⁹ 目前已完成〈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四十一卷第二期，2007.09。

²⁰ 「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內涵，因涉及文學創作層次所反映的思想，故較「文學理論史」「文學批評史」廣泛，且能包含這兩個學科。而《總目》所牽涉的範圍，實不限於「文學理論史」或「文學批評史」一端，其亦涉及館臣對文學創作活動、作品之掌握，故此處以「文學思想史」稱之。此外，《總目》〈提要〉也多見館臣所建構的「文學史」圖像，而我們可從中掌握圖像底層的核心觀念，此亦屬「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範圍。關於「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範圍，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引言〉，《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頁1-12；羅宗強：〈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10），頁1-11。

²¹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開明書店，1979），頁354；敏澤：《中國文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4），〈序〉，頁1-13。

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從一方面看，也不失為系統的文學批評」²²，兩者都已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來肯定《總目》價值，只是這些聲音尚為微弱，且尚未立體展現「歷史理解」的內容與過程。在現存文學思想（或批評）史中，少有專節討論《總目》的內容。事實上，《總目》除了有批評方法、批評內容、亦有批評史的論述。這方面最集中的實踐，應表現在「詩文評類」上。可是，〈提要〉原是目錄版本學的產品，所以館臣的許多見解，往往通過「注解」型態簡潔地詮釋；其中或有「判斷」型態的批評，卻因〈提要〉書寫的成規，顯得僅具「聲明性」，缺乏深刻地舉證、詮釋與推論。²³況且，在乾嘉的學術氣氛中，「注解」與「判斷」經常落於語言或史事的考據上，對於文學見解的表述就顯得相對薄弱、間接。因此，若要研究《總目》的文學思想，可以「詩文評類」〈提要〉為出發，但集部的其他類目提要，亦值得關注，尤其是「總集類」。

「總集」本身即為另一形式之批評著作，實可視為「詩文評」著作的一種表現²⁴。楊松年先生從一九八一發表〈詩選之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之另一方向〉²⁵開始，即致力於選集中所反映的文學批評思想之研究，直至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²⁶仍不斷從理論層次與實踐層次反省與建構中國文學批評史。楊氏曾引王瑤的說法：「中國人一向不太注重詩文評，他們對詩的意見常寓於總集的選彙中。因此，一部《文選》之影響中國詩人文人，是遠遠超過任何一部詩文評之作」²⁷換言之，總集被視為一種具有文學批評意義的表述形式，其中充盪著選編者的文學意識。近十年來，學者們將這種文學批評的形式，稱為「選本批評」，並逐漸視為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重要現象之一²⁸。張伯偉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²⁹一書中，即將「選本」視為一種批評方法，

²² 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收入氏著：《朱自清全集》第三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3），頁27。

²³ 請參見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對歷代詩歌的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5年05期，頁81~86。

²⁴ 當然，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念，如王慶梅就認為「總集」不等於「選集」，其不全然為一種文學批評的表現。見氏著：〈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總集探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4期，頁115~120。唯在〈總集類序〉中，仍可見出批評之義，請詳見下文討論。

²⁵ 楊松年：〈詩選之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之另一方向〉，《中外文學》第10卷第5期，1981.10。

²⁶ 楊松年：《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5），至於理論層次之討論者有〈選集的文學評論價值：兼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實踐層次的討論者有〈王夫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唐詩評選》研究〉、〈王夫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明詩評選》研究〉、〈王夫之《明詩評選》與錢謙益《列朝詩集》的比較研究〉等。

²⁷ 同上註，頁56。

²⁸ 樊寶英特別指出楊松年、張伯偉、鄒雲湖為近年來給與予此論題較多研究者。當然，在這幾位的著作中，亦提及鄭振鐸、魯迅、方孝岳、朱自清、朱東潤等人乃為先行者，本計畫暫不做一一考索。樊氏：〈選本批評與古人的文學史觀念〉，《文學評論》，2005年2期。另黃念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的現狀與反思〉一文，則對方孝岳、王瑤與朱自清的看法，有了更進一部的闡述。（中國大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網址 <http://www.xxjcb.com.cn/LibraryView.asp?LibraryID=262>）

²⁹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1），頁227-325。

並討論其方法的形成、發展與影響。鄒雲湖先生更有《中國選本批評》³⁰一書，論述中國選本批評的變遷，及其原理。香港陳國球先生曾據《唐音》、《唐詩品匯》、《唐詩正聲》、《古今詩刪》等「揭示唐詩在明代受承納的情況，以及復古派詩論的相關發展。」³¹，直至近日出版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³²亦以明代唐詩選編做為接受史討論的核心現象。「選本批評」乃指選編者藉由選擇編纂的活動，展現一種汰刪或保存的主動批評意識與行為。在中國目錄學的分類上，從《隋書·經籍志》到《四庫全書》，「選本」大都被歸於「集部」的「總集類」中。因此，若能通過《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釐清館臣如何面對這些選本及其選編意識？館臣對於選本的詮釋與評價，又展現怎現的文學思想？這些都應能豐富選本批評與《四庫全書總目》兩方面的研究內容。

總之，我嘗試通過「詩文評類」、「總集類」〈提要〉的批評史圖像，顯構作圖像的文學思想。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別集類」的實際批評意義與「文學史」的角度，掘發館臣的文學思想，因為：第一、若「集部」的概念是類似今日「文集」的概念，那「別集」的〈提要〉應具有某種文學實際批評的意義；第二、在館臣的實際批評中，其批評對象——「詩文評類」、「總集類」都具有文學批評文本的質性，所以館臣的實際批評為一種「文學批評的再批評」，而館臣對於「別集類」的批評，則為「文學作品的批評」，此為第一序的實際批評；第三、我們在以批評史角度觀察館臣的文學思想時，不難發現館臣建構的批評史圖像，往往與文學史圖像相伴，如〈明詩綜提要〉³³云：

國朝朱彝尊編。……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朴，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戶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宏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春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歷以後，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么弦側調，嘈噴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出，以記醜言偽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彝尊因衆情之弗協，乃編纂此書，以糾其謬。每人皆畧敘始末，不橫牽他事，巧肆譏彈。里貫之下，各備載諸家評論，而以所作《靜志居詩話》分附於後。雖隆、萬以後，所收未免稍繁，然世遠者篇章易佚，時近者部帙多存，當亦隨所見聞，不盡出於標榜。其所評品，亦頗持平。於

³⁰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7）

³¹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頁 50。

³² 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³³ 《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四十三、總集類五，頁 5（冊）—105-106。

舊人私憎私愛之談，往往多所匡正。六、七十年以來，謙益之書久已漸減無遺，而彝尊此編獨為詩家所傳誦。亦人心彝秉之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館臣使用大量文字，先鋪述明代的文學發展，次以錢謙益與朱彝尊對列並舉，最後展現貶錢尊朱的立場，對於《靜志居詩話》有著正面評價。因此，以「別集類」〈提要〉為研究對象，以館臣「文學史」圖像及其形成為研究視角，應能豐富《總目》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總之，本次申請之研究計畫，擬以《總目》研究對象、「別集類」〈提要〉為研究材料、館臣實際批評中的歷史敘述（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為視角，討論隱藏在敘述文字底層的歷史解釋（即題目、下文所稱謂的「敘解」）內容與模式，並且擴及模式背後館臣自我重構的內涵與意義。

2. 文學研究與歷史——〈集部總敘〉、〈別集序〉所建構的歷史敘述、解釋模式³⁴

當代史學家丹圖（A. Danto）和利科（Paul Ricoeur）曾指出「歷史敘述」、「歷史解釋」是不可分開的，即「歷史解釋的邏輯，就是通過對對象是如何的敘述，而達到對其為何如此的解釋」「敘述在歷史中具有其它解釋方法所不能取代的優先地位。換言之，一切歷史解釋首先和必然是敘述的」³⁵因此，「歷史敘述」就是一種歷史的「敘解模式」（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l），在敘事（「歷史敘述」）的底層仍具有強烈的解釋意義（「歷史解釋」）。若此，德學史學家宙恩·呂森所認為的：「通過敘述的方法，人的大腦掌握了偶然性。它賦予了發生在人類社會變化中的事件的時間序列某種意義。這樣，人類就可以在文化方面受到人類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時間連續性觀念指導。」³⁶據此可以說明：「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並非出於單純外物（過往的歷史事件）與自我（敘解歷史事件者）的斷裂關係，而是一種相攝互函的關係，因為在敘述與解釋的過程中，個別事件在時間中的偶然性，得到序列化，並紛紛被賦予某種意義。甚而，人將受到人類世界與人類自身的「時間連續性觀念指導」，從而產生面對未來的動力。這些當代的史學理論，實能說明《總目》深深隱含館臣的歷史意識、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

〈別集類序〉³⁷云：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於張融《玉海》。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畧》三十卷者，其

³⁴ 〈提要〉的歷史解釋多夾於歷史敘述中，且當代學者甚而認為「歷史敘述」具有「歷史解釋」的性質，故本文以「敘解」一詞稱之。

³⁵ 參見周建漳：〈當代西方哲學關於『歷史解釋』的方法論思考〉，《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2期，頁10-11。

³⁶ 宙恩·呂森撰，張永華譯、姜凡譯：〈賦與時間意義——以歷史意識為概念基礎的普遍分類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01期，頁12。《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四十三、總集類五，頁5（冊）-105-106。

³⁷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別集類一，頁4（冊）-12。

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不可傳者，則繫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恆，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恆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璣並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在這段文獻中，表層述說著集部書籍的發展，尤其是集部體例與數量的發展狀況。但其中亦表露某種主觀性，即顯豁公論標準、慎重去取刪薙。此外，「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之說，更代表四庫全書之纂集，除了為保存文獻外，另有發掘佳著之目的。如此深沉之意義，在〈集部總敘〉³⁸有深入說明：

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為察相，而以殺楊繼盛為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姦，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眇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為文體計也。

明代以降，門戶之見愈發顯明，雖然文人詞翰所爭的只是名譽，但《四庫全書》的纂集，乃至《總目》的書寫，無一不具有「世道之防」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館臣也多從這個角度省視歷史發展、歸納歷史經驗、建立歷史敘述與解釋，甚而形成一套模式。

對於「至公」「公論」的期待與追求，是館臣的基本立場，而其立場的終極目標在「用見聖朝彰善瘴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³⁹的當代關懷，這亦涉及自我文化內涵的建構問題。因此，通過館臣的歷史敘述，考察敘解的基本模式，進而掌握自我建構的意義與價值，便是本計畫的核心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論題的展開，是建立在《總目》「別集類」〈提要〉的研究上。事實上，若將「集部」著作視為類今文學著作，那「別集類」〈提要〉對別集的描述、詮釋與評價，就屬「文學批評」的範圍了。那館臣的「批評」有何特色呢？當我們在面對〈提要〉文本時，不難發現其具有作者鮮明的歷史意識。其意識之發動，

³⁸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頁4（冊）-1。

³⁹ 《總目》，《總目》，卷首三、〈凡例〉，頁1（冊）-38-39。

至少受到兩項因素刺激：首先，館臣所面對的著作即是歷史成品，所以歷史意識便自然運作發用。其次，館臣企圖經由歷史經驗結合現實問題，以指導未來趨向。當歷史意識萌動之後，它們對偶然的歷史事件進行理解，甚而產生解釋與描述。一切歷史敘解必然帶有主觀性，可是館臣卻一再強調追求的是「一本至公」的「公論」。《總目》〈凡例〉第十六條云：

文章德行，自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玘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畧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非止微瑕。凡茲之流，並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

館臣將姚廣孝《逃虛子集》與嚴嵩《鈐山堂集》置於存目書中，並於〈提要〉內書寫被排斥的理由⁴⁰，而其理由背後充滿「公論」的諦造與實踐。館臣一方面服膺千秋以降的公理，一方面欲成就「彰善癉惡」的目的，這些都顯露知識型態「知論」的最後趨向。於是，「公論」⁴¹的概念兼含「時間性」與「道德性」。其「時間性」來自堅信古今存有恆長不變的真理，而「道德性」乃為真理的主要內涵。兩者又相互作用，即道德支撐時間之永恆；時間之永恆鑄造道德之高顯。「道德性」是官方論斷與運作之「道德性」，當然，其「時間性」則為保障論斷與運作為合理者之重要基礎。對於歷史的掌握，館臣通過考據型態展開論述，但終而不免以主觀態度涉入，其至少包括官方權力下的一切關懷。就此看來，《總目》雖力求思辨、解釋在操作層次上的客觀性（或許，這將「公論」的概念帶入了方法學的意義），但終究取代不了館臣們的前理解與目的嚮往等主觀性（此處的「公論」即為目標、理想之意）。因此，本計畫的具體焦點，亦在探究館臣來自期待之「公論」，具有哪些客觀意義與主觀意義？順此意義的彰顯，回應當代對《總目》研究上的呼籲。

綜言之，本研究乃有意重建《總目》「別集類」的歷史敘述；次而考索其敘述表層與內在結構的關係，如內在的社會意識、藝術意識彌漫於圖像表層之狀況；進而顯豁其圖像特色，以便重新詮釋、評估官方文學思想（「公論」）的意義與價值，甚而點出官方思想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故本研究企圖回應上述學

⁴⁰《總目》卷一百七十五，「集部二八·別集類存目二」，〈逃虛子集提要〉：「（姚廣孝）初為僧，名道行，字斯道，洪武中以僧宗泐薦選侍燕邸。燕王謀逆，資其策力居多。……其詩清新婉約，頗存古調，然與嚴嵩《鈐山堂集》同為儒者所羞稱。是非之公，終古不可掩也。」頁4（冊）—653 《總目》卷一百七十六，「集部二九·別集類存目三」，〈鈐山堂集提要〉：「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迹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咏雖工，僅存其目，以昭彰癉之義焉。」頁4（冊）—690。

⁴¹關於「公論」的細部討論，可參見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頁76-106。

術背景，以達成下列目的：

(一) 擴大《四庫》學的研究主題：

若就林慶彰先生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參、四庫學〉⁴²、侯美珍先生〈「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⁴³考察，不難發現關於文學研究的部分，遠不及察考古籍版本的源考、校對補正文獻字句的異同、勾勒編纂過程與纂者生平等等屬於考據性的研究；而在少數的文學研究部分，《總目》「別集類」的研究更為鮮少。此實符合上述周積明先生所指出的現象。所以，本計畫應可擴大《四庫》學（《總目》）的研究主題。

(二) 填補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空隙：

本計畫欲透過歷史的稜鏡，以《總目》「別集類」為基礎，掌握其對於前朝文集的理解內涵，以填補官方文學思想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內容。

1. 甦活文學思想史中固化的印象：

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上，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有霸權性、保守性的意識，可是霸權與保守的形成，應有一定的對治問題，甚至是起於某種集體的焦慮感。而當它一旦成為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會產生一定積極支配或濡化浸染的效果，而逐漸掩蓋某種思想在萌動之初的情狀。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中的官方意識，並且重新爬梳釐清，應可豐富文學思想(史)的樣貌，甚而掌握其特質。

2. 延續個人研究：

就個人研究而言，本人已完成《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之研究，著有《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平評類」的文學思想》乙書；已完成《總目》「總集類」〈提要〉之研究，著有〈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茲以往昔研究經驗與心得，再投入三年時間仔細清理《總目》集分量最重的「別集類」，應能獲得較深入的成果，並提供學界參考。

三、文獻探討

目前據《四庫全書總目》宋、明代別集〈提要〉為研究對象，撰寫論文，探討館臣之歷史敘述及其自我建構。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討論《總目》「總集類」的再批評內容，其中，以歷史的敘解圖像做為探察的核心，然後詮釋、評估館臣自期的「公論」之價值與意義。故本研究的前端問題為——歷史表層與內在結構有何關係？

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歐美文化界與文學界中，出現一種新的文學批方法——

⁴²林慶彰：《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臺北：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1）。

⁴³侯美珍：〈「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書目季刊》第33卷3期，1999.9。

—新歷史主義 (New Historicism)，其對文本與歷史的態度，大抵如下⁴⁴：

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與文本構成了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和共時統一的文本。歷史不同於矢量的時間，歷史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過程，在其中不可逆轉性一再重複出現，過去與未來在文本意義生成中瞬間接通。歷史視界使文本成為一個不斷解釋而且被解釋的螺旋體。歷史語境使文本構成一種既連續又斷裂的感覺和反思空間。歷史高於文本，過程大於結果。

這種態度是對於將文學形式視為 (文學研究) 中心的背離與修正，某程度返回俄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等等學說之前的思想，著重文本的歷史性。文本成為有意義的形式，是經過某種語言具體化、客觀化的結果；而凝聚成形的力量，端賴整個歷史的力量。所以，(語言) 文本只是被壓縮的歷史，在 (語言) 文本之外，還有一個未經語言塑形的文本。換言之，經形塑的文本是壓縮的歷史，且是整個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亦是歷史過程中某種客觀化的「結果」。從後代人的立場來看，歷史就是 (語言) 文本的延伸文本。因此，文本永遠是歷史的文本，它隱含生活世界的隱喻。可是，歷史又具有不可逆轉性，故文本所重複的歷史，是一個經過「解釋」的歷史，正因如此，文本也就成為可「被解釋」的形式，而為一「螺旋體」。文本既為「螺旋體」，歷史又具不可逆轉性，故文本所再現的歷史，不會是「真實」的歷史，它只是一個含帶歷史隱祕的載體。至此，「新歷史主義」的「不可逆轉性」，又使其與「歷史主義」有了差別。

新歷史主義是混雜著馬克思主義、傅科哲學、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思想的理論，姑不論其細節，新歷史主義乃嘗試以階級、權力、性別、種族等角度，解讀文本、理解歷史。本計畫以《總目》「別集類」〈提要〉為研究對象，而該文本是《四庫》館臣面對前代文本的歷史解釋，而其解釋一旦成為文本，旋即成為被解釋者。本計畫乃帶著新歷史主義的基本態度，一方面重建《四庫》館臣的批評史圖像，另一方面尋索關於圖像的「隱喻」。

至於「隱喻」的概念，在研究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的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1928-)《史元》中⁴⁵，有許多論述：

若於正規史著與演繹性歷史哲學必有所區別，則有別者乃是二者之強調方向，而非內涵之互異。以正規史著言，其之建構元素，係散置於敘事內部，嘗於故事脈絡中，立於明顯主要地位者，乃是採訪 (found) 所得史料元素。而演繹性歷史哲學，則循相反方式，係將觀念建構元素攜至表層，明白推演，並施以系統性析辯，至於史料部分，其主要功能僅為闡明或徵驗。故筆者結論乃謂，正規史著之元素中，即包含有歷史哲學，而完整綻放之歷史哲學，其眾元素中，又莫不包含有正規歷史。

歷史著作⁴⁶與歷史哲學有著內在相同性，即「建構元素」同樣存在兩種敘述書

⁴⁴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4)，頁 396。

⁴⁵ 海登·懷特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12)，下冊，頁 575-576。

⁴⁶ 本文以歷史著作代稱「正規史著」的概念，在此指通過史料而勾勒歷史圖像而言，懷特或稱

寫中。只是在論述的表層，歷史著作將建構元素散置於敘事內部，其表層為史料所構成的故事脈絡；歷史哲學則將建構元素直接置於表層，至於史料及其所構成的故事，便是做為闡明或徵驗而已。

就此看來，歷史著作的敘事文本均有其內層結構，而內層結構的本質，「通俗說法是屬於詩學，專業說法則屬於語言學」⁴⁷因此，歷史文本即是具有文學虛構性的文本。歷史文本的虛構性主要來自精製情節、正規析辯詮釋法及意識形態。懷特說⁴⁸：

敘事，或稱事件的句法散居（syntagmatic dispersion），通過作為散文話語的系列，表現出一個綜合形式的闡釋，可以代表話語所採用的「內在趨向」（inward turn），向讀者展示事物或人的真正模式。……敘事的最初模式解構比喻模式中編碼的事件系列（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事件系列），然後在另一個比喻模式中重構事件系列。這樣一來，敘事就成為解碼和重新編碼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新的比喻模式代替了原初由常規、權威、習慣所編碼的比喻模式。因此，敘事的闡釋力量依賴原初編碼與重新編碼的對立。

敘事活動就是一個不斷重新編碼的活動，而在編碼的過程中，「敘述的故事凝塑成一特定類型故事，並為該故事注入『意義』」⁴⁹這即為精製情節詮釋法。海登·懷特循精製情節詮釋法的語相，區識成四種：傳奇式、悲劇式、喜劇式、諷諷式。⁵⁰換言之，符碼的內容是事件系列，而編纂的意義除了是建構以外，也含帶著對原初編碼的衝撞，甚或是取代。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取代並非故事外貌的取代而已，更是「意義」的取代。史學家將自己對於歷史的析辯詮釋與意識型態，展現在歷史圖象的深層結構中，所以每個歷史敘事自有其面貌。至於深層結構表諸於敘事文本，其方式不外於詩學、語言學中所說的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等四種類型⁵¹。

為” historiography”（歷史編纂），其在〈「描繪逝去時代的性質」：文學理論與歷史寫作〉指出：「過去的事實，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歷史編纂，這是歷史學家關於這一對象所寫的話語；以及歷史哲學，這是對上述對象和上述話語之間可能關係的研究。」即對歷史著作與歷史哲學做出基本區分。該文收入拉爾夫·科恩主編，程錫麟等譯：《文學理論的未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6），頁 46。

⁴⁷ 同註 78 所揭書，上冊〈序言〉，頁 xxvii。

⁴⁸ 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該文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5），頁 176。

⁴⁹ 同註 78 所揭書，頁 10。

⁵⁰ 傳奇式主要以「英雄之超凡成就並自俗世得到解脫為表徵」、「強調救贖」；諷諷式「乃以人類最終仍為天地之囚徒而非其主人」、「強調消散」；喜劇式乃「將人類暫時克服其所居之世界，植基於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正在運作之各種力量間之偶而妥協。而此種妥協又以歡樂合作為表徵，喜劇作家慣已歡樂場合作為其對於變遷、蛻化敘述之結尾。」；悲劇「結尾所顯示之妥協，則較為陰鬱，其特質係顯示人類對於環境必然較認命，處於此情勢之下，人類必須辛勤努力。」同上註，頁 10-13。

⁵¹ 海特認為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需要塑造出事件間的因果律，故他自歷史敘述裏區分四種歷史詮釋的典範，其分別為：形式論者、有機論者、機械論者、文脈論者。至於意識型態，乃指處身在現世社會習尚之下，欲對社會有所作為而持有之方案，而他[進一步區分四種意識形態的立場：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自由主義。結合正規析辯、意識型態與精製情節，便構成史

《總目》雖非全部透過精製情節而形成歷史圖像，但其述評各作家、作品時，本質是歷史理解，文本則為述評兼備的歷史著作，因此，其理解內容應仍為喻法的表現。又若借用新歷史主義前驅人物傅科的權力概念，我們應可將《四庫》館臣的「公論」視為官方權力的某種表述，甚或支配，而其權力之瀰漫乃構成歷史評述的內容。

事實上，新歷史主義者的見解，與中國史學傳統，頗有相通之處。如孟子曾指出：《春秋》乃為「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⁵²之著作，「事」為歷史事件，「文」為重新編碼的敘事文本，「義」則為史家的意見。此外，《春秋》的「微言」，則又與懷特所說的喻法有相似之處。而司馬遷的「述往事，思來者」⁵³「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⁵⁴則充分將歷史敘述的主觀性（「成一家之言」），以及文本乃將過去（「往事」現在（「述」與「思」的活動）、未來（「來者」），做一瞬間接通，亦通於新歷史主義者的理解模式。換言之，無論從新歷史主義或《春秋》學、《史記》等中國史學精神看來，歷史圖像含帶史家的主觀性，為一相通之思想。因此，視《總目》「別集類」〈提要〉中文學批評史的圖像為某種隱喻，則成為整個研究的基本預設。

五、討論與結果

2010年4月24日應邀出席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發表近來研究經驗，題名〈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觀研究芻議〉。該發言稿（論文）約七千字，以海德格爾《林中路》扉頁題詞為接契點，陳述〈提要〉體例與研究者感受，並以「從歷史敘解到自我瞭解」「從自我瞭解朝向形塑遠景」為節次，說明以歷史敘述、敘解模式與自我重構為研究《總目》之可能進路，並指出《總目》文學觀念研究有待展開的方向，約有：1、重構《總目》文學觀念。2、掌握《總目》文學觀念的基本模式與表達方法。3、評價《總目》文學觀念的內容、模式與表達方法。4、考察《總目》文學觀念的形成（包括分纂者與《總目》〈提要〉、《總目》〈提要〉與書前〈提要〉、《總目》〈提要〉與《簡目》〈提要〉的關係）。5、《總目》文學觀念與現、當代古典文學研究論述的關係。發表該文乃企盼藉工作坊活動，分享本研究計畫之構想，並聽取臺灣、香港、大陸等地學者建議。會中獲得陳國球、張少康、張宏生、

家著述的個別風格。另外，海特認為要將歷史敘述客觀化以呈顯外現，乃需通過比喻法。而比喻法可分四種：隱喻——「藉彼此相似抑或互異之語辭，經由類比或直喻，刻畫某一現象之特質」；轉喻——「即一物之全稱，可藉該物部分之稱謂予以取代」；提喻——「其係就賦與整體之性質中之部分，以表徵整體」；諷喻——「凡是將字義文面肯定之物，於象徵層面中予以否定」簡言之，隱喻本質是代表、隱喻是化約、提喻是整合、諷喻則是反語。參見註78所揭書，〈導論：歷史之詩學〉，上冊，頁3-54。此外，本文引朱立元所說，其「隱喻」為廣義者，實包含海登·懷特的四種喻法而言。

⁵² 【清】焦循：《孟子正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7），頁574。

⁵³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834。

⁵⁴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卷六十二，〈司馬遷傳第三十二〉，頁697。

張健、汪春泓諸教授意見，頗有收獲。茲擬擴大內容，撰成單篇論文，發表於日本長崎中國學會刊物，期望能與日本四庫學學者交流。

此外，目前正撰寫〈《四庫全書總目》北宋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一文，擬討論北宋古文發展譜系、北宋詩歌發展圖像，及其文學思想內涵，預訂今年七月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中。

六、成果自評

(一) 基礎工作與成果

自 97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本案 3 年期計畫，今年度為第 2 年計畫。依照計畫書執行工作如下（第 1 期部分不述）：

- 1、研讀《總目》基本文獻，並指導助理擇要注解宋、明代〈提要〉。
- 2、因應實際需要，增加比對《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書前〈提要〉異同之工作。目前進行宋至明代〈提要〉部分。
- 3、整理宋、明代別集作者資料。

宋、明代〈提要〉資料過於旁雜，整理、擇要注解頗為費力，進度較為緩慢。唯主持人仍以書寫論文為主要工作，並引導助理割捨旁枝。

(二) 發表論文

本計畫第 1、2 年期已撰成之論文計有：

1. 會議論文：

- (1) 曾守正、2010.4.24、〈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觀研究芻議〉，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本文為第 2 年成果】
- (2) 曾守正、2009.2.17、〈《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以詩歌史圖像為觀察角度〉，日本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環中國海研究學會、長崎中國學會主辦「第四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本文為第 1 年成果】
- (3) 曾守正、2009.5.8-9、〈《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十一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武俠小說』及『文學理論』」（本文據前文修訂，並擴增「古文」論題）【本文為第 1 年成果】

2. 期刊論文

曾守正、2009.12、〈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二十一期。（據會議論文修改）【本文為第 1 年成果，並於第 2 年正式刊出】

七、參考文獻

- 1、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初稿）——考察「公論」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第二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日本）福岡大學，2006 年 12 月 9、10 日。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 2、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輔仁國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年2月，頁73-101。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 3、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以明代批評史圖像為考察對象〉，第十屆文學與美學暨第二屆中國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2007年6月21、22日。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 4、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9）【獲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 5、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初稿）〉，2007年第九屆東亞漢學暨檀國大學60週年校慶學術會議、（韓國）檀國大學，11月09、10日。修改後刊登於《書目季刊》
- 6、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四十一卷第二期，2007.09。
- 8、曾守正：〈在「抒情傳統」之外：官方文學論述研究的省思〉，《淡江中文學報》第十七期，2007.12
- 9、楊雅筑：〈《四庫全書總目》詩話界義與作品分類析論〉，第二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日本）福岡大學，2006年12月9、10日。

【附錄】明代別集〈提要〉書目清單

682	明/太祖朱元璋撰、姚士觀等校刊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
683	明/宋濂	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
684	明/宋濂	宋景濂未刻集二卷
685	明/劉基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686	明/汪廣洋	鳳池吟稿十卷
687	明/陶安	陶學士集二十卷
688	明/宋訥	西隱集十卷
689	明/王禕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
690	明/張以寧	翠屏集四卷
691	明/危素	說學齋稿四卷
692	明/危素	雲林集二卷
693	明/唐桂芳	白雲集七卷
694	明/林弼	登州集二十三卷
695	明/劉崧	槎翁詩集八卷
696	明/釋妙聲	東臯錄三卷
697	明/朱同	覆瓿集七卷附錄一卷
698	明/凌雲翰	柘軒集四卷
699	明/朱右	白雲藁五卷
700	明/謝肅	密庵集八卷
701	明/貝瓊	清江詩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
702	明/蘇伯衡	蘇平仲集十六卷
703	明/胡翰	胡仲子集十卷
704	明/徐一夔	始豐稿十四卷
705	明/王彝	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706	明/張孟兼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707	明/孫作	滄螺集六卷
708	明/錢宰	臨安集六卷
709	明/童冀	尚綱齋集五卷
710	明/趙撝謙	考古文集二卷
711	明/劉炳	劉彥昂集九卷
712	明/藍仁	藍山集六卷
713	明/藍智	藍澗集六卷
714	明/高啓	大全集十八卷
715	明/高啓	鳧藻集五卷
716	明/楊基	眉庵集十二卷

717	明/張羽	靜居集四卷
718	明/徐賁	北郭集六卷
719	明/林鴻	鳴盛集四卷
720	明/王恭	白雲樵唱集二卷
721	明/王恭	草澤狂歌五卷
722	明/王行	半軒集十四卷
723	明/孫蕢	西菴集九卷
724	明/陶宗儀	南村詩集四卷
725	明/郭奎	望雲集五卷
726	明/管時敏	蚓竅集十卷
727	明/董紀	西郊笑端集一卷
728	明/李昱	草閣集六卷拾遺一卷附筠谷詩一卷
729	明/鄭潛	樗菴類稿二卷
730	明/烏斯道	春草齋集十卷附錄一卷
731	明/袁華	耕學齋詩集十二卷
732	明/袁華	可傳集一卷
733	明/殷奎	強齋集十卷
734	明/陳謨	海桑集十卷
735	明/梁蘭	哇樂詩集一卷
736	明/王冕	竹齋集三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737	明/史謹	獨醉亭集三卷
738	明/袁凱	海叟集四卷
739	明/吳伯宗	榮進集四卷
740	明/王翰	梁園寓稿九卷
741	明/劉璉	自怡集一卷
742	明/胡奎	斗南老人集六卷
743	明/虞堪	希澹園詩三卷
744	明/龔穀	鷺湖集六卷
745	明/鄭真	滎陽外史集七十卷
746	明/王紳	繼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747	明/僧宗泐	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748	明/練子寧	練中丞集二卷
749	明/方孝孺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750	明/程通	貞白遺稿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751	明/王叔英	靜學文集一卷
752	明/周是修	芻蕘集六卷
753	明/程本立	巽隱集四卷

754	明/劉璟	易齋集二卷
755	明/龔詡	野古集三卷
756	明/張宇初	峴泉集四卷
757	明/唐之淳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758	明/解縉	文毅集十六卷
759	明/王僊	虛舟集五卷
760	明/王紘	王舍人詩集五卷
761	明/梁潛	泊菴集十六卷
762	明/王洪	毅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763	明/胡儼	頤菴文選二卷
764	明/王璉	青城山人集八卷
765	明/楊士奇	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
766	明/楊榮	楊文敏集二十五卷
767	明/黃淮	省愆集二卷
768	明/夏原吉	夏忠靖集六卷附錄一卷
769	明/金幼孜	金文靖集十卷
770	明/王直	抑庵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
771	明/李昌祺	運甓漫稿七卷
772	明/唐文鳳	梧岡集八卷
773	明/李時勉	古廉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774	明/曹端	曹月川集一卷
775	明/薛瑄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
776	明/劉球	兩溪文集二十四卷
777	明/于謙	于忠肅集十三卷
778	明/謝晉	蘭庭集二卷
779	明/李賢	古穰集三十卷
780	明/徐有貞	武功集五卷
781	明/倪謙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
782	明/韓雍	襄毅文集十五卷
783	明/陳獻章	白沙集九卷
784	明/岳正	類博稿十卷附錄二卷
785	明/柯潛	竹巖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補遺一卷
786	明/鄭文康	平橋稿十八卷
787	明/彭韶	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
788	明/童軒	清風亭稿七卷
789	明/張寧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
790	明/邱濬	重編瓊臺會稿二十四卷

791	明/徐溥	謙齋文錄四卷
792	明/何喬新	椒邱文集四十四卷
793	明/沈周	石田詩選十卷
794	明/鄭紀	東園文集十三卷續編一卷
795	明/李東陽	懷麓堂集一百卷
796	明/倪岳	清谿漫稿二十四卷
797	明/吳與弼	康齋文集十二卷
798	明/朱存理	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稿一卷野航文稿一卷附錄一卷
799	明/羅倫	一峰集十卷
800	明/程敏政	篁墩集九十三卷
801	明/章懋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802	明/莊昶	莊定山集十卷
803	明/黃仲昭	未軒文集十二卷
804	明/賀欽	醫閭集九卷
805	明/周瑛	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
806	明/吳寬	家藏集七十七卷
807	明/謝遷	歸田稿八卷
808	明/王鏊	震澤集三十卷
809	明/梁儲	鬱洲遺稿十卷
810	明/林俊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
811	明/張吉	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
812	明/蔡清	虛齋集五卷
813	明/邵寶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
814	明/羅玘	羅圭峰文集三十卷
815	明/吳儼	吳文肅公摘稿四卷
816	明/鄒智	立齋遺文五卷
817	明/石瑤	熊峰集十卷
818	明/史鑑	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
819	明/胡居仁	胡文敬公集三卷
820	明/方良永	方簡肅文集十卷
821	明/秦王朱誠泳	小鳴稿十卷
822	明/祝允明	懷星堂集三十卷
823	明/羅欽順	整庵存稿二十卷
824	明/顧清	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
825	明/李夢陽	空同集六十六卷

826	明/鄭岳	山齋集二十四卷
827	明/顧璘	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存稿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
828	明/邊貢	華泉集十四卷
829	明/張羽	東田遺稿二卷
830	明/劉麟	劉清惠集十二卷
831	明/孫緒	沙溪集二十三卷
832	明/王守仁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
833	明/杭淮	雙溪集八卷
834	明/康海	對山集十卷
835	明/何瑋	柏齋集十一卷
836	明/潘希曾	竹澗文集八卷竹澗奏議四卷
837	明/何景明	大復集三十八卷
838	明/崔銑	洹詞十二卷
839	明/魏校	莊渠遺書十二卷
840	明/陸深	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
841	明/徐禎卿	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
842	明/孫一元	太白山人漫稿八卷
843	明/鄭善夫	鄭少谷集二十五卷
844	明/韓邦奇	苑洛集二十二卷
845	明/夏良勝	東洲初稿十四卷
846	明/楊慎	升庵集八十一卷
847	明/夏尚樸	東巖集六卷
848	明/孫承恩	灑溪草堂稿五十八卷
849	明/林文俊	方齋詩文集十卷
850	明/薛蕙	考功集十卷
851	明/許相卿	雲邨文集十四卷
852	明/張岳	小山類稿二十卷
853	明/王廷陳	夢澤集二十三卷
854	明/文徵明	甫田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
855	明/黃佐	泰泉集十卷
856	明/朱樸	西村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857	明/朱澗	天馬山房遺稿八卷
858	明/高叔嗣	蘇門集八卷
859	明/李舜臣	愚谷集十卷
860	明/王慎中	遵巖集二十五卷

861	明/陸粲	陸子餘集八卷
862	明/羅洪先	念庵集二十二卷
863	明/皇甫汈	皇甫司勳集六十卷
864	明/楊爵	楊忠介集十三卷附錄三卷
865	明/唐順之	荆川集十二卷
866	明/皇甫涿	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
867	明/黎民表	瑤石山人藁十六卷
868	明/邱雲霄	南行集四卷東遊集二卷北觀集四卷山中集十卷
869	明/張永明	張莊僖文集五卷
870	明/尹臺	洞麓堂集十卷
871	明/王立道	具茨集五卷補遺一卷文集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遺稿一卷
872	明/沈鍊	青霞集十一卷年譜一卷
873	明/李攀龍	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874	明/任環	山海漫談三卷附錄二卷
875	明/楊繼盛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
876	明/王世貞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
877	明/王世貞	讀書後八卷
878	明/王樵	方麓集十六卷
879	明/楊巍	存家詩稿八卷
880	明/趙完璧	海壑吟稿十一卷
881	明/張元凱	伐檀齋集十二卷
882	明/海瑞	備忘集十卷
883	明/葉春及	石洞集十八卷
884	明/宗臣	宗子相集十五卷
885	明/胡直	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
886	明/佘翔	薜荔園集四卷
887	明/郭諫臣	郭鯤溟集四卷
888	明/沈鯉	亦玉堂稿十卷
889	明/溫純	溫恭毅公集三十卷
890	明/歸有光	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891	明/謝榛	四溟集十卷
892	明/盧柟	蟻螻集五卷
893	明/胡應麟	少室山房類稿一百二十卷
894	明/于慎行	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

895	明/孫繼臯	宗伯集十卷
896	明/楊寅秋	臨臯文集四卷
897	明/余繼登	淡然軒集八卷
898	明/顧憲成	涇臯藏稿二十二卷
899	明/顧允成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錄三卷
900	明/高攀龍	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
901	明/馮從吾	馮少墟集二十二卷
902	明/畢自嚴	石隱園藏稿八卷
903	明/曹于汴	仰節堂集十四卷
904	明/鄒元標	願學集八卷
905	明/劉宗周	劉戡山集十七卷
906	明/婁堅	學古緒言二十五卷
907	明/李流芳	檀園集十二卷
908	明/周順昌	忠介燼餘集三卷
909	明/范景文	范文忠集十二卷
910	明/徐燿	幔亭詩集十五卷
911	明/孫傳庭	孫白谷集六卷
912	明/葛昕	集玉山房稿十卷
913	明/宋登春	宋布衣集三卷
914	明/盧象昇	忠肅集三卷
915	明/倪元璐	倪交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 編四卷詩集二卷
916	明/凌義渠	凌忠介集六卷
917	明/申佳允	申忠愍詩集六卷
918	明/魏學洵	茅簷集八卷
919	明/黃淳耀	陶庵全集二十二卷